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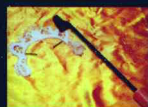
北京工艺美术保护丛书

京剧盔头彩塑脸谱制作技法

杨玉栋题



杨玉栋 著



学苑出版社

京剧盔头 与彩塑脸谱 制作技法

杨玉栋 著

熊启瑞 杨东海 摄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京剧盔头与彩塑脸谱制作技法 / 杨玉栋著 ; 熊启瑞 ,
杨东海摄 . —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 2011.3

ISBN 978-7-5077-3756-1

I . ①京… II . ①杨… ②熊… ③杨… III . ①京剧—
脸谱—制作 IV . ① J821.5 ② TS93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3263 号

出 版 人 : 孟 白

责任编辑 : 潘占伟

封面设计 : 徐道会

出版发行 :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79

网 址 :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 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尺寸 : 720×980 1/16

印 张 : 11.25

字 数 : 14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6.00 元 (平装)



序

一

玉栋的《京剧盔头与彩塑脸谱制作技法》即将出版了，这真是件值得庆贺的事。算来盔头的制作已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专业介绍盔头制作方面的书。玉栋弥补了这个空白，也是为京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正如他书中所说，过去很多行业的手工艺人一是因为文化水平有限，二是鉴于“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古训，所以盔头制作一直是口传心授，外行难以入门。在京剧亟待振兴的今天，玉栋从工具和备料讲起，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京剧盔头的制作过程，使众多京剧脸谱爱好者也能了解盔头，尝试自己动手制作盔头。他这种“广教会”的做法值得称赞。

特别是当我了解到由于经费所限，由北京市经济信息委员会、工美行业协会出资支持，在学苑出版社大力支持下，他主动放弃了稿酬，义务出版了此书，这真可称为善举。

我们两家住的不远，前不久在我的要求下，他冒着酷暑拿来了十余件作品，并笑着说是到圣人面前卖《三字经》来了。当他打开包装把作品展现在我面前时，我十分震撼。老实说，我一生也见过

不少工艺脸谱，但能做得如此精美实属罕见。看得出他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工夫的。他自我介绍说：“我不搓麻，不下棋，不养花鸟虫鱼，虽然也喜欢，可没时间，甚至没时间遛遛弯儿、锻炼身体，只有这个爱好，这就是玩儿。”玉栋的“玩儿”玩得高雅，玩得精致。

他的作品中有几个有毛病，如他做的矮脚虎王英原是个光嘴巴，我告诉他应该是“一”字髯，我说时他都一一认真记下，书中都改过来了。我想就凭他这种认真求索、这种“较真儿”的劲儿，他的作品一定会日趋完善。

看了他的作品我问他：“你登台演出过吗？”“没有。”“拜过师吗？”“没有。”“会唱戏吗？”“不会。”我有些愕然，一个梨园门外汉仅凭爱好，凭着到处学与问能把工艺脸谱做成这样，其中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

玉栋说新书发行之时准备办个作品展，我期待着展览的开幕。

刘曾复

2010年10月



序二

杨玉栋是北京市一级工艺大师。在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中有一个特色鲜明、工艺完整、具有独特表现方法和艺术风格的品种——“京剧盔头、彩塑脸谱”，这是杨玉栋在总结发扬传统艺术的基础上精心研制的。

有位成功人士曾对我感慨过：“一个人要成就一件事，必须要用一生的时间。”我在工艺美术行业干了四十多年，深知探求传承、研发创新的艰辛，杨老师研制“京剧盔头、彩塑脸谱”的过程，当称这句话有力的佐证。

自从200年前四大徽班进京，经过几代京剧艺术家乃至全社会各阶层的全面的陶冶和锤炼，京剧艺术成为朝野共识的国粹。其文化精髓对京城诸多文化形式的发展，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在工艺美术领域，剧装包括戏服（主要是京绣工艺的运用）、盔头、靴子、髯口、把子，被一并列为重要品种，而京剧脸谱也被引入手工艺术品，经再创作，以工艺品的形式，被制作成大小不等、款式不同的陈设品、礼品、旅游纪念品推向市场。在业内，大家公

认，将脸谱技艺发展成为盔头、脸谱技艺，杨玉栋功不可没。

我和杨老师认识这么些年，据我了解，他研制“京剧盔头、彩塑脸谱制作技法”并最终形成成熟的品种，原因是他具备四个基本条件：

一是对京剧艺术浓厚的兴趣。

从小家庭环境的熏陶，使杨老师的兴趣从京剧的生旦净末丑以及唱念做打，发展到对整个道具、行头全息的研究，所以听杨老师聊京剧总是一种享受。我还听一位朋友讲过，有一年杨老师去美国交流考察，正好赶上参加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除夕迎新春联欢会。杨老师一曲“三家店”感动四座，尤其是唱到“儿想娘身难叩首，娘想儿来泪双流”时，大使馆内几位长年离家在外的外交官触景生情，泪光熠熠。这位朋友评价，杨老师的身段和嗓子当然不能和专业京剧演员相比，但其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二是从对脸谱艺术的研究入手，发展到对盔头技艺的研究。

多年来民间有不少艺术家对京剧脸谱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并使脸谱成为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中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种。杨老师也是从这里入手的，而且是童子功。他沿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将京剧脸谱工艺与盔头制作结合起来，并使之完善。这样，产品就和京剧舞台上的一样。在脸谱之外配饰形态各异、华美精致的盔头，比单纯的脸谱的艺术形式更加完整，更具表现力，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将戏剧人物塑造得更加完美，二是艺术装饰的特色更加突出。

三是科班的专业化学习。

杨老师科班专业化的学习分两个阶段。先是中学以后考入现在北京艺术设计学院的前身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学习。当今许多闻名中外的北京工艺美术大师、民间工艺大师都是这所学校培养出来的。



再者是参加工作以后调到北京盔头戏具生产合作社，系统接触了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又拜到北京著名“盔头张”老艺人门下专门学习，并最后成了老艺人的姑爷。这两个阶段为杨老师研制“京剧盔头彩塑脸谱制作技法”提供了中西方工艺美术史论、传统技艺的基本功，以及姊妹艺术的精华和系统的京剧盔头制作技术等，掌握了研制“京剧盔头彩塑脸谱制作技法”的所需知识和技能。

四是具体品种的研制。

虽然具备了以上条件，杨老师在进入研发过程后，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围绕着这一品种锲而不舍地钻研着。其中的甘苦自不待言。从戏曲实用盔头到工艺美术品中需要的盔头，即把立体盔头转变为尽可能展示原貌的半立体盔头的制作，是一个比脸谱制作更为复杂的工艺过程。杨老师所著的这本书中记述的关于这一品种的所用工具、制作方法、工艺特点、成果介绍，都充分说明了杨老师用一生成就这一品种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据我了解，顾客们买杨老师的作品目的大有不同：有的是冲着杨老师的名望为了收藏；有的专买穆桂英等武旦作品，是为了装饰居室；有的专买钟馗，是为了精神上的寄托，在装饰居室的同时，寄托驱邪除恶、纳福迎祥的美好愿望；有的专买关公，是因为钦慕关老爷忠义千秋，同时还起到供奉财神的作用；有的专买美猴王，或是对应自己的生肖，同时还企盼着美猴王“玉宇澄清万里埃”，驱妖降魔……

在杨老师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我作为北京工艺美术工作者，衷心地感谢北京市政府对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关心和支持。2003年北京市政府颁布了《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并拨付保护和资金，鼓励工艺美术大师和民间工艺大师们总结自己技艺经验著书立说，以利后人传承发扬。杨老师作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传承人，此书是得到市政府关注和支持的项目。杨老师研制的“京剧盔头彩塑脸谱制作技法”，将会随着这本书流传下去，在北京传统工艺百花园中永远怒放，艳丽芬芳。

朱 洪

2010年11月

(北京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秘书长)



前言

这是一本打了七八年腹稿、吹了三年“牛皮”的书，今天能够脱稿，算是了却一桩心愿。自 2003 年被北京市经济信息委员会评为“北京民间工艺大师”后，我感到了身上的压力：按上级要求大师要带出徒弟，找好接班人，但实际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在当今这个精彩的、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中，有几个年轻人能像我们这一代人那样拿着 37 元低工资，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十几年如一日学好一门技术？自己辛辛苦苦培养了近三年的徒弟，在掌握了盔头制作的基本技法后，遇到更合适（即工资更高）的工作，立即义无反顾“跳槽”了。社会的现实教育了我，于是我想到了写书，用这种“广教会”的方法，发现和培养爱好者，把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培育成盔头制作业的接班人。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古训使我们丧失了多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虽然是个梨园门外汉，但愿意把我的所知、所学奉献给读者。抛砖引玉，目的只有一个——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盔头制作业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京剧的诞生而兴起，民国末

期至 60 年代初进入鼎盛时期。“文革”前北京盔头戏具生产合作社曾有三百多名员工，各道工序分工明确，各有技术能手。除盔头制作技艺首屈一指的张连成外，擅长刀枪把子制作的“把子宋”宋登玉、“把子许”许寿昌，擅长制作大带的“大带李”，擅长“点翠”的郑珠，擅长“打髻口”的邵景和、张国华，擅长做绒球的何凤鸣……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是他们在远离舞台喧闹的车间里默默无闻的劳动，才有了舞台上“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今天京剧艺术得到重视，培育新人“要从娃娃抓起”了，近年来各行当也确有一批新秀脱颖而出，但他们的后勤——盔头、剧装制作业又有多少人认真关注、大力支持过呢？在这里我由衷地感谢北京市经济信息委员会、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他们申报、审批的“专项保护发展资金”就是本书的催生剂。

几年前一次接待媒体采访时我无意中谈到自己想写本这方面的书，不料这位老弟给捅上报纸还不算完，不知哪位高人又给捅上网，这下麻烦大了，很多朋友都问我：“老杨，书什么时候出啊？”这大概就叫“社会压力”吧，那时我想如果筹集不到资金，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把书出了，不然真成“吹牛不上税”了。

最后重申，我只是个学了几年工艺美术的中专生，对深奥莫测的京剧艺术只粗识皮毛而已。这点可怜的知识是从舞台上、电视里看，书本中学，求教于梨园界的朋友及京剧爱好者而得的，难免会有很多错误，敬请诸位方家匡正。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一段曾是那么熟悉而今又有些陌生的童谣把我的思绪带回童年。

1943年我出生在天津。从记事时起（大概三四岁吧），妈妈带着哥哥、两个姐姐和我来北京找父亲。那时父亲和几个伯伯及朋友在北京西单牌楼往西的路北开了家“大光明影戏院”，父亲任经理。我家就住在紧邻剧场的后院，哥哥和我睡觉的房间与剧场仅“一板之隔”。大家不是常说一墙之隔吗，怎么成了一板之隔？原来北京的老戏园子多为木质结构，“奉天会馆”的老戏楼即大光明影戏院也是如此。只有南面临街的一面墙是砖木混合结构，其余三面全是木质结构。哥哥比我大六岁，鬼点子可多了。每晚我俩躺在床上听着隐约可闻的锣鼓声却看不见戏，不由心里来了气。他在枕头旁边的木板墙上画了个圈，趁剧场里没人时从我家院里的旁门溜进剧场，让我用块小石头在划好的圈上敲，他听了听。又在我敲击的位置上敲了敲，两点合一，齐了！他跑回来在炉子里烧红一根通条，然后对准画好的记号捅去。凉了再烧，再捅。捅了五六次，一寸左右厚的木

板墙被捅穿一个洞，位置在最后一排的观众落座后头顶上一尺左右。哥哥又在洞上边用一个钉子钉了块小木板，不看戏时洞口用木板挡住。晚上躺在床上木板往上一转，我们哥俩儿就可以轮流看戏了。“躺着看戏”够牛吧！看到什么《闹天宫》、《拿高登》、《八大锤》等台上战将云集要“开打”了，我俩一咕噜爬起来从院里的旁门钻进剧场跑到台前看个痛快。后来我发现了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每晚六点左右溜进后台，可以看到演员化妆。干干净净的一张脸一会儿工夫画成五颜六色，发现你在看他冷不丁龇牙咧嘴冲你来个“鬼脸儿”，可真够吓人的。还有那各式刀枪把子——鲁智深的禅杖、关羽的青龙刀、李逵的大斧，任你舞弄个够。演员戴的各种帽子（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它们统称为“盔头”）真让人大开眼界，那丑官戴的纱帽可好玩儿了，戴上它一走动两边的帽翅一颤一颤。只可惜个儿都太大，戴上去眼睛都遮住了！

后来家里遭变故，父亲因“资助青年学生逃往延安，往共区偷运医药、电台”等“罪名”，1948年7月7日被当时北平警备司令部的丁义质（此人曾任重庆渣滓洞看守所所长）带人逮捕，关进炮局监狱，判了个“长期感训”，即无期徒刑。1949年1月23日北平和平解放，看守们都跑了，解放军砸开牢门，“犯人”们重获新生。

解放后党和政府给了父亲极高的荣誉和地位，他做过北京市工商联执行委员，市电影业同业公会主任，北京市二区（即今西城区）工商联办事处主任，二、三届市人大代表，二区政府委员等。可惜他居功自傲中了“阳谋”。1956年底在文化部长周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非党员干部座谈会上，他给所在单位的党领导提了十三条意见，在其中十一条被调查属实后，春节前他被安排带演出队去近郊农村做巡回演出，过了年4月份回京被告之划为四类右派。在“降职降薪”和“自动辞职”两条出路中，他一怒选择了后者，从此



一家人开始了不一样的生活。大姐那年北航毕业，国家本来保送她去苏联留学，因父亲的问题，美梦破灭了。哥哥在天津读师大，二姐、我和弟弟都在读书，可想而知当时父母肩上的生活担子有多重。父亲是个不服输的人，他奋力向命运抗争。他写了一本制作儿童服装的书，妇女出版社本来答应出版，后来可能是调查出他有右派帽子，此事就吹了。他自己制作儿童服装，拿到市场去卖，被说成“投机倒把”，后来只能靠变卖家产来勉强维持生活。雪上加霜，1960年母亲又患了脑中风，在床上瘫了五年，因缺医少药52岁就撒手人寰。倔强的父亲又当爹又当妈艰难地挑起这副家庭的重担，直至1979年1月27日国家为他彻底平反。1981年1月13日他走完了坎坷、艰难的人生之路。原单位为他召开的追悼会上高悬一幅挽联——“碧血终身文艺界，丹心捍正美名扬”，算是对他后半生的一个评价吧。我们姐弟五人大姐为高级工程师，大哥和三弟为特级教师，二姐是某中学的校长兼书记，本人也于2003年被市政府市经委认定为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大师，也算可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了。

回忆这段辛酸的往事并非是我对“反右”耿耿于怀，而是因为当时中国历史上这场涉及面最广、受害人最多的冤案与我后来的人生之路有着直接的关系。

1960年在几乎是家徒四壁的环境中我初中毕业了。当时我是班长，学校给了我们班两个名额，保送去一所新成立的高级外事院校，班主任推荐我和另一位同学。我考虑到自己的出身，婉言让出了名额。查遍了当时可以报考的学校后，我选择了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原因很简单：不交学费，学校还包吃包住，这可以尽早解决家里的一个人的负担啊！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突击”美术，著名画家颜伯龙之女颜家宝老师给了我极大帮助，经常给我“开小灶”。最终顺利通过考试，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喜极而泣。从此我不再是家里

的累赘，我将踏上从艺之路。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的四年里，除文化课外我们系统地学习了素描、泥塑、艺用人体解剖、国画、图案、色彩等专业知识，使我一生受益。特别是在泥塑课中我们有幸得到“泥人张”第三代张景祜先生的高徒——沈吉、郑于鹤老师亲授，“泥人张”的仕女“开脸”烘染等技法我至今仍应用于彩塑脸谱的绘画中。三年级时沈吉老师曾带我们去参观了北京彩塑厂，看着一排排色彩鲜明、造型各异的工艺脸谱，以及老师傅屏气静心笔走龙蛇般的绘画技巧，我不由得看得着了迷，谁想这一迷就是半个多世纪！记得小时候随爷爷去白塔寺庙会花五分钱（当时的伍佰元）买了个磕“泥饽饽”的陶制脸谱模子，回家来和点黄土翻出泥胎。也做过“涂鸦之作”，但那最多也就算是个鬼脸儿。今天才真正见到彩塑脸谱的制作工艺，当时我想毕业后能分到这儿来多好。不想事与愿违，四年级时我被分配到“花丝首饰设计与制造专业”。那个年代是被后人称为“理想与奉献”的时代，“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要“干一行爱一行”。可是一个大小伙子谁愿意整天为女人设计什么项链、胸花、戒指，并要把它当成终身职业？这就是命！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花丝镶嵌厂设计室。那时这个行业可“火”了，据说出口创汇额在“燕京八绝”中占前三名。后来又在陶然亭建立了一个首饰二厂，城里一些小厂也改行生产首饰。

1966年刚过了元旦，厂领导找我和两位老技师谈话，说城里有个叫“北京盔头戏具生产合作社”的小厂也要生产出口首饰，让我们去做设计和制作的指导，工资和待遇不变。该厂在前门外珠市口，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又可以天天回家了！（花丝厂在通州，只能每周回家一天）关于这个厂原来是做什么的等问题连问都没问就答应了。等到该厂报到后参观时才发现，这原来是个制作盔头（演员戴的帽子）、把子（刀枪）、髯口（胡须、头套）的工厂！



多少儿时的记忆瞬间又涌上心头。算来自父亲划为右派后，我已有十年没再进过剧场，今天猛地见到这些儿时的玩具，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十年一个轮回，没想到今天又和它们走到一起。当时盔头社要上马的新产品花丝首饰和老产品盔头戏具的制作同在一个大车间里，所以参观各种盔头的制作过程很容易。一晃半年过去了，那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灾难来临了，宣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戏禁演了，为资产阶级小姐太太们服务的首饰禁产了，当年的盔头社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早在8月23日市文化局市文联在孔庙烧剧装、烧刀枪把子、批斗“黑帮”（我们的老舍先生就是因为这场批斗会被逼迫致死）之前的7月26日，就在车间门前的马路上燃起一堆大火，把成品、半成品的盔头、把子付之一炬，以表明我们与“封资修”彻底决裂的决心。大火灰飞烟灭连余温都没了之后，当时厂里这五六百人干什么、吃什么成了问题，于是小到五金店里的平光垫（螺丝螺母之间的垫圈）、做针线活儿的顶针，大到自行车的税牌，来个“老虎吃蚂蚱——大小不论”，有活儿就干。幸亏那八个给八亿人看十年的“革命样板戏”陆续出炉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样板戏”服务了，厂子才没解散。从“文革”一开始设计室就解散了，统统去车间劳动，十多年来我做过戏具、冲压、模具钳工、电位器组装工等多个工种，但我最喜欢干的还是戏具。记得那时做过李玉和的红灯、阿庆嫂的茶壶茶碗、座山雕座椅上方的大雕、“扮华侨进匪巢”时洪常青戴的太阳帽等。这些戏具虽表面看来与传统戏的盔头风牛马不相及，但它所用的一些原材料及制作工艺是相通的，心有灵犀则能举一反三，这也为我日后制作小盔头打下了基础。

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痛心疾首：多少为共和国开国大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名将转瞬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野心家”、“叛徒”、“工贼”，多少文学、科技、文艺界名流

统统成了“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总之各行各业凡是过去稍有成就的统统挨批斗。那是个培养混混儿和盲流儿的时代：广播中听到了几个字便一哄而起，敲锣打鼓上街逛半天再说，反正工资照发。我从心里烦透了这个人人在演戏、天天在演戏的时代。不是说“要读点鲁迅”吗？鲁迅有句名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于是我经常请了病假，躲进蜗居。那时我家独门独院的四合院已被某分局副局长以“黑五类不能住在东方红大街两侧”为借口，逼我家与他换了房，我们搬进一个住了十几家的大杂院。病假时闲得难受，我又翻出了一直珍藏的脸谱资料，和泥、制模、脱胎、晾干、绘画都躲在那间十五平方米的小屋里进行。这要是被革命群众发现了，甭废话，这是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翻案呐！所以画完了自己欣赏一番，用纸一包，装在盒子里塞到床下。时间一长床下塞了大概有几百个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那时父亲年迈多病，我已有了个两三岁的儿子，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艰苦时期，而我和爱人的工资又是多年一贯的三百七十大毛，家里能卖的东西早已卖光。父亲看着这几大盒脸谱和我商量：“要不然拿出去卖卖试试？”那时“红色恐怖”已经过去，社会风气有所缓和，于是父亲找了个旧镜框，后面钉块木板，裱上白纸，在上面钉了十几个小钉，在三十多年前他创办的“大光明影戏院”旁、一个老熟人开的小杂货铺门外支起了镜框。不料生意竟出奇地好：小光头五分至一毛一个，带泥盔头、髯口的关羽、张飞三毛至五毛一个，有时一天能卖三五元。这在当时可是笔不少的钱，够我一家一天的生活费，这不仅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更使我认识到我们的国粹艺术已深深扎根于群众心里，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任何个人的思想不能取代的。

万恶的十年浩劫终于熬到了头，父亲的问题也彻底平反，我被调到厂工会负责宣传。那时厂里早已改为生产电子元件，但仍保留